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 文件资料汇编

上

(1991——2006)

▶ 刘金质 潘京初 潘荣英 李锡遇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 文件资料汇编（上卷） （1991—2000）

刘金质 潘京初 潘荣英 李锡遇 编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 刘金质, 潘京初编.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12-3010-2

I. 中... II ①刘...②潘... III. 中朝关系—外交文件—汇编—
1991~2006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440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张 颖
封面设计 葛 维

书 名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上卷)
(1999—2000)
Zhongguo yu Chaoxian ban dao Guojia Guanxi Wenjian Ziliao Huibian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 毫米 1/16 28 $\frac{3}{4}$ 印张
字 数 1011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38.00 元(上、下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编者说明

《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91 - 2006》是《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19 - 1949》(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 1949 - 1994 年》(1994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续编。其中 1991 年到 1994 年 8 月的资料有些重复,出要出于如下考虑:第一,冷战行将结束,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第二,《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 1949 - 1994 年》印数有限,一书难求。90 年代初正是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大幅调整的关键时期,涉及到苏联解体后朝鲜同中国关系的走向、中国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对中朝关系发展的影响。

本汇编包括如下内容:第一,《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 1949 - 1994 年》的文件补遗;其中有新近解密的外交文件和毛泽东的讲话、电报、批示、文章等 96 件;第二,1991 年至 2006 年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公开文件资料 2061 件。其中包括 16 年来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政府声明、双边关系中的相互往来、相关函电、联合公报、联合声明、条约和协定。《人民日报》的相关社论、评论和报道。这些文件和资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朝鲜半岛国家的政策以及在处理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基本原则。本汇编注意收集了朝鲜、韩国领导人及其政府在中国问题的政策主张。本汇编为全面了解中国对朝鲜半岛国家的政策和中朝、中韩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系统、丰富的文献资料。

本汇编收录的文件和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均选自《人民日报》及《新华月报》。本汇编所收资料系历史文献,一般均全文收录。为保持历史原貌,编者对文中原有的称谓、提法和评述未加更动。但对报道中的某些标题做了变动,以突出主题。

本汇编设有补遗目录和正文目录及分类索引,以便读者查询。第一,补遗和正文目录分列,均按时间(年、月、日)顺序编排;同一日期的文件,一般按领导人讲话、政府声明、联合公报和声明、相关报道评述的顺序排列。第二,分类索引:相关的文件资料加以集中,编排在—个主题之下;将涉及几个主题的文件分别重列于各个主题之中。第三,本汇编还设有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论文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

本汇编共分两册。每册起止时间只为照顾篇幅的基本平衡,并无特定的含义。所录用的文件按补遗和正文目录所述原则,统一编排序号。

本汇编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金质、潘京初、潘荣英、李锡遇编纂,刘金质教授审定。潘京初编制了分类索引。潘荣英提供相关研究论文索引。

本汇编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赞助,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者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2006 年 12 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对朝鲜半岛国家政策

(历史文献回顾)

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交往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赢得了独立。由于美国和苏联的介入,以三八线为界朝鲜半岛的北方和南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分别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此后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6日中国同朝鲜建交,韩国和台湾当局维持外交关系。^①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国在联合国旗号下的干预,朝鲜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政府的要求赴朝参战。朝鲜战争构筑了在冷战体制下的中国、朝鲜、韩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对这两国的政策:全力支持朝鲜,全面对抗韩国。^②

冷战结束后,中国加强和发展了同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1992年中国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韩两国领导人商定要携手构筑和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朝鲜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主张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愿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抗美援朝 保卫和平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所发生的第一场热战,是东西方斗争的一次严重升级。朝鲜战争是战后南北朝鲜分治、美苏矛盾和对峙的必然结果,是冷战向朝鲜半岛扩展的产物与表现。朝鲜战争既是东西方冷战在亚洲的延续,又是东西方较量的一种新的更为危险形式。

朝鲜分裂后,南北双方都希望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实现统一。双方斗争激烈,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并有随时升级的发展趋势。1950年6月25日终于爆发朝鲜战争。战争伊始,朝鲜人民军迅速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美国政府认为这是苏联操纵朝鲜实施其“战争计划”,因而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决定进行军事干预。

中国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做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

① 有关政策文件请参见刘金质等编《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相关政策文件请参见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 1949-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以下简称《汇编》。

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① 7月6日，周恩来就安理会6月27日通过的关于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致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该决议“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②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领导人了解朝鲜希望以武力统一半岛的愿望以及苏联的态度。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同外相朴宪永秘密抵达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斯大林“形势已有变化，北朝鲜人可以行动”的口信。毛泽东在确认了斯大林的意思后，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态度是被动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本来优先考虑的是解放台湾问题，既然斯大林已同意朝鲜统一，中国也就给予支持。但是，中国领导人事先并不知晓朝鲜武力统一和发动武装进攻的计划。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三个决议，指责朝鲜进攻韩国，要求会员国向韩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及成立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入朝参战。7月27日，联合国军在釜山登陆。而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中共中央军委讨论并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随后中央军委又决定组建第二线兵力，以期策应东北边防军。从8月份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开始，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了出兵的想法。毛泽东在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③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况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处境艰难。美国扬言要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和联合国机构的监督下举行“选举”，由南朝鲜来“统一”朝鲜半岛。10月1日，朴宪永携带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飞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恳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援助。^④ 毛泽东主持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反复讨论出兵问题。毛泽东于10月2日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⑤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做出了出兵的决定，但不是最后的政策抉择。当日深夜，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印度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⑥

是否出兵朝鲜涉及到新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做决定时非常谨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出兵朝鲜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7-138页。

② 《汇编》第12页。

③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④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4-15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

⑥ 《汇编》第44页。

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①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说：“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手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命令同时强调了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政治基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军队、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② 同日，周恩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谋求苏联更多的军事装备和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时提供空军援助。毛泽东在得知斯大林决定暂时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13日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是否出兵问题。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当天，毛泽东把政治局的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而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③ 10月18日，即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前一天，毛泽东下定决心出兵朝鲜。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由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直至朝鲜战争结束。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就朝鲜形势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商定成立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朝联合军司令部。毛泽东提出分为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便于协作，研究解决问题。12月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强调整顿纪律，改善同朝鲜同志和人民的关系。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指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与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④

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制定了抗美援朝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5次战役到1951年6月交战双方的对峙局面稳定在“三八

①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2-14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6-147页。

线”附近。^①毛泽东强调抗美援朝要作长期打算,“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②“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③

中国一贯主张公平合理地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制定了停战谈判的对策: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④在谈判中,“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⑤早在1950年8月20日,周恩来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支持苏联的建议,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敦促停止敌对行动、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1951年1月13日周恩来建议举行包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和中国在内的七国会议,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及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基础上谈判结束战争。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向杜鲁门提出的建议中提到了政治谈判以达成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凯南受命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探讨谈判的可能性。马立克在6月23日提出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撤离“三八线”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中朝联合答复同意谈判。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正式开始。谈判和战争并存。在长达两年的谈判中,双方主要围绕着议程、划定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停战的安排与监督以及战俘的安排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的规定,1953年7月27日22时,朝鲜战场的交战双方完全停止了一切敌对行动。朝鲜战争作为军事行为结束了。但是,朝鲜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外交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有待双方继续努力解决。其中最为棘手的是战俘的遣返^⑥和政治会议的召开。

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第一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得朝鲜战争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东西方之间的热战。朝鲜战争使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分裂固定化,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对朝鲜和韩国的基本政策和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基本格局。

^① 这5次战役的时间是:第一次战役,1950.10.25—11.5;第二次战役,11.25—12.4;第三次战役,1950.12.31—1951.1.8;第四次战役,1951.1.15—4.21;第五次战役,1951.4.22—6.10。(根据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提供的材料整理)。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1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6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3—354页。

^⑥ 根据停战协议的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时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拦。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由5个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看管。自该委员会接管之日起90天内,战俘所属国家派代表向他们解释他们的权利。90天期满后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交政治会议设法解决。30天过后尚存的战俘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取消其战俘身份,以平民相待。中朝的遣返工作在9月6日完成,共遣返对方被俘人员12760名,另将359名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美方为遣返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中朝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10天。政治会议也未能举行。1954年1月20日和2月1日,美方将21900余名朝中被俘人员分别押解到南朝鲜的浦项、群山和台湾的基隆。有关资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第209—210页;《国际关系史》第8卷,第102—104页。

二、巩固和发展同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朝鲜战争使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用鲜血凝成了战斗友谊。中朝两国党、政府和人民特别珍惜这种友谊。从1953年朝鲜停战至今，中朝维持了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尽管其间也曾有过曲折。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和中国都支持朝鲜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斗争。中苏矛盾和分裂迫使朝鲜做出政策选择。朝鲜对中国和苏联的态度势必影响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以及中朝关系的发展。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改变了对朝鲜半岛国家的政策，退出了冷战时期形成的东北亚战略格局。中国继续保持同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支持朝鲜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发展的斗争。

1. 支援朝鲜的经济恢复与建设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继续给予朝鲜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中国向朝鲜提供了经济援助。1953年11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11月23日，中朝两国签署了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在11月23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中方表示：“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协定签署后，并没有马上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机关发出指示，要求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救济受灾群众，并抽调大批人、财、物力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中国政府同意朝鲜派技工和技师到中国某些生产部门和厂家实习，派中国技工和技师到朝鲜协助工作。中国同意朝鲜留学生到中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1958年9月27日，中朝签订了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朝两国还签署了其他一些经济合作以及科技与文化交流协定，促进了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2. 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

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在该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在朝鲜半岛举行自由选举，以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平、独立的新朝鲜。1953年8月24日，周

^① 《汇编》第616页。

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① 8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向中国转达联合国大会第430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两项决议。9月13日，周恩来做出答复，指出政治会议的任务“并非如停战谈判的任务之为纯军事性质，因此它不可能仅由在朝鲜的交战双方加以解决和保证。同时关心这个会议的前途的，也不仅是交战双方的国家，而且还有其他一切有关国家。”因此，政治会议除交战双方，还应有中立国家参加；采取圆桌会议形式；中国和朝鲜的代表有权参加联合国大会讨论政治会议的会议等等。^② 中国主张参加政治会议者除交战双方，还应扩大到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

中国的立场和建议并未得到美国的重视和赞同。美国政府通过瑞典先后于9月19日、24日和10月9日向中国政府转达了三个通知。周恩来就此于10月10日发表声明，“同意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这一会谈不仅应当解决政治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应当解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会谈的地点以在朝鲜板门店为宜”。声明特别强调，中国政府认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而应该有除朝鲜交战双方之外的其他有关中立国家参加，以利会议的顺利进行，从而谋求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0月14日，美国政府同意举行会谈。19日，周恩来通知美国政府，同意10月26日在板门店和美国政府代表会晤，除解决美方同意的有关政治会谈的地点、时间以及有关程序的行政管理和安排方面的各项问题外，“更主要的还是应该解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③ 中、朝和美国代表有关政治会谈问题的会晤于1953年10月26日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在议程达成协议后，11月17—18日分两个小组就政治会议的成员、地点和时间进行磋商，但未能取得结果。在11月30日的第二次会晤中，中、朝代表团提出了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1953年12月12日，美国代表宣布无限期休会。

由于苏联政府的积极推动，1954年2月2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有武装部队参加战争并愿意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开幕，延续到6月15日，历时51天。参加会议的除中、苏、美、英、法及朝鲜南北双方，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现名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则立场。第一，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从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中国就提出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认为这对维护朝鲜和平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既然朝鲜已经停战，任何外国军队就没有理由继续留驻此地。撤走外国军队不仅

① 声明的内容：（1）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战争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2）政治会议应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行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联合国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再谈论其他问题；（3）政治会议的成员除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印度、波兰、瑞典、缅甸、朝鲜和南朝鲜以外，凡以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在朝鲜进行战争的国家，可被考虑作为停战的一方参加会议；（4）联合国关于政治会议的讨论不让中、朝代表参加是不合理的，联合国大会有责任将一切有关政治会议问题的各项提案和建议随时通知中朝两国政府。（《汇编》第528页）

② 《汇编》第554—555页。

③ 《汇编》第581—583页。

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也是各出兵朝鲜的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会议应该达成有关协议，定期从朝鲜同时撤走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愿意承担义务，与有关国家一道来保证不干涉朝鲜内政，保障朝鲜的和平发展。第二，举行自由选举。中国主张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选举，建立全朝鲜政府，并把朝鲜建成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因此，“一切外国军队撤离出朝鲜是朝鲜人民在全面选举中自由表达意志的先决条件。”^① 鉴于朝鲜的实际情况，为了筹备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并促成南北接触，中国赞同成立一个包括朝鲜和韩国双方代表的全朝鲜机构，处理朝鲜内部的事务。这就需要南北双方的相互协商，达成协议和谅解，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由中立国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负责对朝鲜的选举进行监督。^② 中国的主张遭到了美国方面的反对。由于与会双方立场的尖锐对立，根本无望达成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中国、朝鲜还是努力争取双方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上达成某些共识和谅解。周恩来建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与会国发表共同宣言，保证不采取任何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中国“建议本会议采纳莫洛托夫先生的五项建议作为继续进行讨论的基础”。^③ 美国代表拒绝了上述建议。中国代表团为了挽救会议，使之不致破裂，提出了最低限度的具有和解性质的建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美国等炮制了十六国宣言，声称“共产党国家代表拒绝承认联合国在朝鲜的权威与职能，并拒绝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因此，本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并认为应把这个会议进行的情况通知联合国”。^④

关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片面宣布中止而破裂。日内瓦会议是朝鲜停战后，中朝同美国等国的首次交锋与较量。会议尽管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没有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最低限度的协议，但是它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圆桌会议的形式却具有积极作用。会议勾画了在解决朝鲜问题、实现朝鲜统一的力量配置和主要矛盾。第一，中朝方面为了促使政治会谈的举行，在会议成员、地点和日期等问题上采取了灵活政策，做出了让步。但在实现朝鲜统一的实质性问题，中朝坚持原则，坚决主张从朝鲜半岛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由朝鲜自主进行民主选举，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第二，形成了基本的力量配置：中国、朝鲜有共同的立场和政策，得到了苏联的支持；美国的意图和政策主宰了停战协定签字的另一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朝对抗美韩。中国支持朝鲜，美国支持韩国，对立双方泾渭分明。第三，朝鲜半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外国军队的去留问题。朝鲜坚决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而韩国主张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北方、美军继续驻扎在南方。第四，会议所反映出来的双方立场的严重对立，预示着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是相当困难的，它不仅意味着南北朝鲜的力量消长和相互关系的调整，消除彼此的对立，而且也说明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在其中能起的作用和应该起的作用。会谈进程及其结果表明，美国不会在解决朝鲜半岛的关键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

1957年11月2-20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同金日成首相商定中国人民志

① 《汇编》第737页。

② 《汇编》第745页。

③ 《汇编》第744页。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愿军于1958年撤出朝鲜。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朝鲜”。2月7日，中国政府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中国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磋商。2月14-21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访问朝鲜。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当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① 1958年3月16日-4月25日、7月11日-8月14日以及9月26日-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人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②

3.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中苏分歧乃至分裂给中朝关系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朝鲜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既不愿意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在平衡同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时，朝鲜不同时期的做法略有不同。因此，中朝关系也有一些变化。指导朝鲜处理同中、苏关系的理论基础是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其实就是独立自主，维护和赢得自身的国家利益。

60年代上半期，中苏分裂局面已经出现。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面临着在苏联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的严重问题，朝鲜也不例外。大约在1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站在自己的一边。中国为了支援朝鲜的七年计划，于1960年10月13日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1961年8月，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③ 周恩来强调“中朝两国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也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犯”。^④ 条约具有明显的军事同盟的性质。1963年6月5-23日，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应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邀请，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会见并宴请崔庸健一行。刘少奇和崔庸健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进行了会谈。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朝两党、两国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正如宣言和声明所正确指出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是各国共产党人当前严重的战斗任务。”《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中朝人民友好团结的新高峰欢呼》的社论，称崔庸健的访问“使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合作，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应崔庸健的邀请，

^① 《汇编》第942-947页。

^② 第一批：1958年3月16日-4月25日，撤出6个师8万人；第二批：7月11日-8月14日，撤出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第三批：9月26日-10月26日，包括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

^③ 条约规定：1，双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相援助和支持的基础上，决心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共同保障两国人民的安全、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2，“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3，“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汇编》第1279-1280页）

^④ 《汇编》第1281页。

刘少奇于当年9月15-27日访问了朝鲜。刘少奇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9月27日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重申：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在1963年6月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具有巨大的意义。1963年12月25日，金日成和崔庸健电贺毛泽东70寿辰，盛赞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和朝鲜人民的亲密朋友”。中国高度评价了朝鲜党和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赞扬朝鲜“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肩负着光荣的任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肯定朝鲜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朝鲜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有成效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的纯洁性”，“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的政党”。中朝两党和两国政府在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4. 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发展

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它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苏东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也在政治上孤立朝鲜。虽然中国给予朝鲜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但是这种援助并不能弥补朝鲜的损失。1965年开始，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采取措施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以争取朝鲜来对付中国。朝、苏关系的发展，自然影响了朝中关系。1965年开始中朝就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1966年中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都是一场灾难。它同样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朝关系出现过紧张状态，处于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低潮。中国的红卫兵对朝鲜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抨击。中国曾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两国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1967年底被召回国，直到两年半之后才回北京。1967-1969年，在中国的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分别为8件、5件和7件）。基本上都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和报道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然而，双方都在努力维持着某种关系。

1969年底、1970年初，中朝双方都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其基本原因之一是此时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两国走上了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美、苏三国关系的上述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苏联不支持朝鲜的对抗行动，令朝鲜大为不满。中朝双方认真审视了过去几年两国紧张关系的不良后果，特别是中国开始纠正“文革”中的过激行为，这些都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1969年10月，崔庸健率领朝鲜党和政府高级代表团来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庆典活动。10月2日，周恩来总理同崔庸健一行举行了会谈。新华社就此发表电讯，称“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①朝鲜和中国派驻对方的大使分别到任。应金日成首相的邀请，周恩来于1970年4月5-7日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自1963年刘少奇访朝以来，中国方面访问朝鲜的最高级代表团。中朝联合公报中称：“双方认为，进一步巩固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友好团结，完全符合共同事业的利益；并且表示坚定的决心和希望，两国人民将继续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活动的共

^① 《汇编》第1770页。

同斗争，进一步发展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关系。”10月中朝代表团互访，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20周年。双方领导人相互祝贺节日，措辞热烈。在1970年的公开报道中，有关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文件多达45件。

自崔庸健访华和周恩来访朝之后，中朝两国继续保持经常性的高层互访。1975年4月18-26日，金日成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金日成，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金日成及朝鲜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逝世，朝鲜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崔庸健也故去。1977年两国没有高层互访。1978年5月华国锋应金日成的邀请访问了朝鲜。9月，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1979年5月，邓颖超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咸兴市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揭幕典礼，金日成主席亲临机场迎接。1980年10月李先念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和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但应该看到，在此期间中方表现积极，而朝方则相对冷淡。朝鲜来华访问的是一些友好参观团以及文化、友协代表团，但这些代表团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会见。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1981年1月，朝鲜政务院总理李钟玉访问中国。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李钟玉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关心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争取国家早日统一的斗争，在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始终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鲜血结成的，有着牢固的基础，它必将世代地传下去”^①。同年12月，赵紫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劳动新闻》12月20日的社论指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来访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的重要里程碑”。1982年4月，邓小平和胡耀邦应金日成的邀请访问了朝鲜。1982年9月16日，金日成主席前来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正式国事访问。这是金日成时隔7年对中国的访问。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金主席一行。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邓小平还陪同他到四川参观访问。

根据公开报道，从1982年9月金日成访华到1992年6月，中朝重要官员互访85次，其中朝方访华71次，中方访朝14次。^②在此期间，访问朝鲜的中国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5月和1985年10月）、赵紫阳（1989年4月）、江泽民（1990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86年10月）、杨尚昆（1988年9月和1992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鹏（1991年5月）；外交部长吴学谦（1983年5月）和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1991年6月）。

朝鲜方面访华的领导人有：金日成4次非正式访问（1984年11月、1987年5月、1989年11月和1991年10月）；总理姜成山（1984年8月）、李根模（1987年11月）和延亨默（1990年11月）；副总理兼外长金永南（1984年2月和1988年11月）。在这些访问中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和平统一的途径，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互相通报了情况，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1990年3月14日至16日，江泽民访问朝鲜期间同金日成在小范围探讨了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江泽民通报了中国和韩国互设贸易代表处的问题，以咨询朝鲜方面的意见。他向金日成表示：“不管国

^① 《汇编》第2303页。

^② 根据《汇编》第2353-12610页所提供的材料统计。

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立场决不会改变。决不会做对不起朝鲜人民的事”。除了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中朝两国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与往来。

5. 强调传统友谊 主动恢复高层政治对话

在中韩建交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朝没有重要互访。中国为打破这种局面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993年7月和9月，中国先后派出党政和人大代表团访朝。在中国的公开报道中，朝鲜到1993年12月才派了一个艺术代表团访华，但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中国特别注意摆正同南北朝鲜的关系，推行一种近似平衡但各有侧重的外交，以维持和发展同南北朝鲜的友好关系。中国继续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江泽民于1994年6月7日在接见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时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同朝鲜的友好关系”，“加强和发展中朝友谊，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将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①8月底，朝鲜特使访问中国，双方就有关在朝鲜半岛和平保障机制的问题上交换了意见，认为从目前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朝鲜半岛局势出发，需要建立新的保障机制。中国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根据朝方已召回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朝方代表团和军停会实际已停止运转的现状，决定调回军停会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但中国主张，在朝鲜半岛新的和平保障机制建立之前，停战协定依然有效，各方均得遵守。9月，江泽民、李鹏在会见朝鲜副主席李钟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时重申中国愿意同朝鲜共同努力，把中朝友谊世代发展下去的愿望，“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各自国内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友谊将是永恒的”。^②1995年8月27日，江泽民在会见朝鲜艺术家时表示，“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这种友谊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等老一代领导人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做出不懈努力”。^③

江泽民1995年10月8日在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庆祝朝鲜劳动成立50周年宴会上的讲话，10月9日给金正日的贺电以及《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0日社论《光辉的历程》，都对朝鲜劳动党作了高度评价。讲话和社论称，朝鲜劳动党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具有长期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朝鲜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和领导者。50年来，朝鲜劳动党领导英雄的朝鲜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一贯奉行自主、友谊、和平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推进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传统的深厚友谊，这种友谊是鲜血凝成的，是经受了历史严峻考验的，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两国人民之中，具有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视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并把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一友谊作为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长期方针。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不仅符合中朝两党、两

① 《汇编》第2648页。

② 《汇编》第2658—2660页。

③ 《人民日报》1995年8月28日。

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论今后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将坚持不懈地为维护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而竭尽全力”。^① 1996年5月，中朝签署“经济技术交流协定”。从此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1998年9月8日江泽民致电金正日热烈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贺电充分肯定了朝鲜和政府领导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良好愿望。贺电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朝鲜历史的新纪元。朝鲜人民从此走上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捍卫国家主权与庄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朝鲜政府“奉行自主、和平、友谊的外交政策，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以金正日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周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把朝鲜和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事业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贺电表示：“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中朝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在两国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同发展起来的，已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一向十分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今后将一如既往为此而竭尽全力”。^②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席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盛大宴会，热烈祝贺朝鲜人民的光辉节日。^③

1999年6月3日至7日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华是中朝关系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朝鲜高级代表团自1991年10月金日成第39次访华以来的首次访问。江泽民会见了金永南，李鹏同金永南举行了会谈。江泽民指出，中国党和政府将一如既往，继续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他说“中国党和政府一向珍视中朝传统友谊。目前，我们两国都在根据各自的国情，以自己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江泽民重申中国对朝鲜局势的关注和处理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支持南北双方实现自主和平统一；希望北南改善关系；支持朝鲜同美、日、欧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并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江泽民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天下仍很不太平。当前人类正处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关键时期。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江泽民还向朝鲜领导人强调，中国的实践证明，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一是经济实力，二是保卫自己的国防能力，三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民族凝聚力。只有综合国力提高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④ 李鹏委员长在同金永南会晤时指出，在世界之交朝鲜党和政府派出党、政、军各方面负责同志组成的高规

① 《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0日。

② 《人民日报》1998年9月9日。

③ 《人民日报》1998年9月8日。另据《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报道，韩国驻华大使馆于9月28日举行宴会庆祝韩国建国50周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王光英出席了招待会。

④ 《人民日报》1999年6月5日。